

前往武乡

□ 肖克凡



《地雷战》 彭 彬绘

我岳父生前经常说到山西武乡，以及武乡砖壁村。他老人家没文化，只会写自己名字“王绪元”三个字。然而“武乡”成为晚年忆旧关键词，显然饱含战争岁月的情感。

此行有拜访八路军总部王家峪的日程，我自然兴奋不已。王家峪坐落武乡县境内，武乡正是我岳父念念不忘的地方。他1938年7月在武乡参加革命成为秘密交通员，1939年转入八路军129师386旅独立团担任班长，后来升任16团炮兵连连长。我记得他说过，“我们行军时见过刘邓首长呢！”

不知为什么，我岳父生前多次说到砖壁村八路军总部，还谈及从太行军区到太岳军区。我推测他不曾驻防王家峪，于是对砖壁村印象深刻。行前我查阅相关资料，得知1939年秋到1940年夏八路军总部驻扎武乡王家峪，之后迁往武乡砖壁村。在东渡黄河后艰苦抗战的岁月里，八路军总部屡次转战，先后5次进驻武乡，从而创建了晋冀鲁豫、晋绥、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，使之成为华北抗战的中流砥柱。

乘车前往武乡王家峪，一路上我期待尽早抵达武乡八路军总部，那是我心中的热土。中途停车李峪村，参观“王来法纪念馆”，我有些心猿意马。

纪念馆迎面墙壁挂着几百只地雷模型，横匾七个大字写着“地雷大王王来法”，勾起了我的回忆，想到那部老电影《地雷战》，认真了起来。

这位被称为地雷大王的王来法本是河北省人，年幼逃荒来到李峪村。1938年日军入侵武乡，他的养父被残酷杀害，这点燃王来法内心的复仇火焰。他挺身而出带领村里青壮年组建抗日自卫队，并担任村武委会主任，前往县武委会学习爆破技术，他心灵手巧，很快掌握了装雷和埋雷技能。

1943年日军在蟠武镇修筑炮楼设立据点，李峪村多次遭受日寇扫荡，损失严重。我太行军区八路军决定发起蟠武战役，围歼蟠武公路沿线日军据点，以此孤立敌

无数次北上南下,无数次经过长江。

这是长江流经湖南的最后一段,长江之南就是我的家乡临湘市。

曾经,我对宋朝诗人王安石的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耿耿于怀,那一个简单的“绿”字,让那条宋人记忆中的长江,生机盎然。而我视野中的这一江流水哩,我是多么渴求它有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的景致。

记忆也罢,渴求也罢,一次行走,让我找回了“又绿江南岸”的风景。

正是人间五月,一个适合出行的季节。透过薄薄的云层,天是瓦蓝瓦蓝的。阳光张开翼羽,飞翔在天地之间,所有的气息透明而纯净。我们沿湘北长江岸线而行,微风动,落花香。江岸草木葳蕤,江淮绿树婆娑,反嘴鹳、白鹭时而展翅高飞,时而在江面浮游,时而安静驻足……路上,不时遇到休闲的市民,在堤岸上缓缓行走。一对新人在长江边拍婚纱照,阳光、绿树、江水,还有一线绿色的岸,一同摄进最珍贵的影像里。

春风又绿江南岸成为了现实。

不可想象的是,曾经的这里,一度码头云集,砂石堆积,机器喧闹,尘土飞扬,有人形象地总结为“三步一黄土,五步一堆石”。长江像一个蓬头垢面、衣衫褴褛的老母亲,怎不让人忧让人痛。污水过度排放,鱼群难觅踪影,长江生态持续恶化,威胁着沿线居民的生存质量。

儒溪白马矶就是一个亲历者,见证着临湘长江沿岸风貌的变迁。那时候,李白笔下“侧叠万古石,横为白马矶。乱流若电转,举掉扬珠辉”的白马矶成了客货两用的码头,每天凌晨到深夜,人多人多货多,险象频频。一个个简陋繁忙的私人码头让千年白马矶不得安宁,也严重破坏了江岸生态。去年初,临湘痛下决心,取缔拆除了这些私设码头,并在原址整体复绿。曾经裸露的岸滩栽上了柳树、榉树、桑树,堤面两侧撒下了草籽。一簇簇青翠正顽强地从泥缝中探出头来,伸展着被压弯的腰身,这四千年“白马”又有草吃了。

行到江南镇长江村,白墙黛瓦,淡墨轻岚,仿佛走进一卷水墨丹青。进村,一位老妪热情地邀请请进屋喝茶,一落座,老人就絮絮叨叨地打开了话匣子:“住了几十年的屋场,以前毛荒草乱,烂泥巴路,

人。王来法积极参战，带领民兵自卫队不分昼夜出没在蟠武公路两侧。他们白天钻进青纱帐造地雷、装地雷，夜晚摸黑在公路上埋设地雷，以封锁敌人出击。无论日军出动大队人马清剿，还是出动小股兵力突袭，只要脚踏蟠武公路便无法避开王来法布下的地雷阵，经常被炸得晕头转向人仰马翻，于是有了“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李峪村王来法”的传说。

即使日本鬼子趟过地雷阵进村搜查，王来法他们也早在院门里挂好手榴弹，用这种“挂雷”给敌人送上“见面礼”。

中国军民抗日是持久战。由于物资匮乏，武器紧缺，铁制地雷壳供应不足，王来法利用石头制造石雷，一举成功。我看到纪念馆地上摆着形状不同的石雷，几乎就是未经打磨的石块，那装填火药的石孔塞着木楔，看似样貌简陋，却蕴含着杀伤力。

这间纪念馆玻璃展柜里陈列着很多地雷原件，令我想起电影《地雷战》，那银幕里的人物显然就是王来法的化身。1943年王来法获得“杀敌功臣”称号。1944年7月“太行首届群英会”上，获“太行地雷大王”荣誉嘉奖，那面锦旗上写着“抗战柱石，建国先锋”八个大字，落款是“晋冀鲁豫边区”。我被“建国先锋”四字所吸引，遥想抗日战争尚未取得胜利之时，晋冀鲁豫边区军民便满怀建立新中国的崇高理想，这正是坚定初心使然。

时过境迁，今天的李峪村在发展农业种植同时，紧紧抓住“地雷大王故乡，魔术文化兴村”的思路，将红色文化与魔术表演紧密结合，做成文化旅游产业。谁说红色文化不是软实力？谁说民间艺术没有吸引力？且看一辆辆旅游大巴开进村前广场，一拨拨旅行团赶来观看抗日情景剧，李峪村的文化旅游产业做得风生水起，名声远扬。

告别李峪村，我忽有所悟。魔术在京津地区也称为“戏法儿”。当年地雷大王自造石雷把侵略者炸得晕头转向，等于跟日本鬼子变起“战争戏法儿”，如今和平年代硝烟散尽，地雷大王的后代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开发第三产业，给游客们变起“幸福戏法儿”。

在韩北乡王家峪村参观八路军总部，朱德总司令的住室、彭德怀副总司令的住室、左权副总参谋长的住室，还有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住室……我感慨万千。

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周边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栽种的小树，如今其势参天。特别那几株大杨树堪称神奇，你将小树枝的横纹轻轻掰开，树枝横断面便清晰呈现红色“五角星”图案，极像红军战士帽徽，这几株大树被称为“红星杨”。

暮色降临，赶到武乡县城参观“八路军太行纪念馆”，在八路军迫击炮展台前拍照留念，我意外发现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团长武亭将军戎装照片。武亭是我岳父在炮校学习时的教官，也是他生前经常念叨的名字，正是他多次念叨武乡地名，使我这次红色之旅收获满满……

垃圾满村，现在好了，道路好走了，屋场干净了，多幸福啊！”大家听完，齐声笑了起来。

缓步走在村庄，有三五村民或站或坐，闲话桑麻。娃崽们在嬉戏打闹，江南水乡的恬适生活跃然眼前。这样的村庄比比皆是，新洲、谷花、鸭栏、灯塔村……，一村一景，一村一业。

乡村“蝶变”，源于乡村振兴、空心房整治催生的成果。近年来，当地集中整治长江沿线一些无人居住的空心房，为村民择地修建整齐安全的新居。

不远处的黄盖湖因三国名将黄盖得名，与长江仅一堤之隔，偏居湘北一隅。相传三国时在此操练水军的黄盖，献上苦肉计，巧施诈降，火烧赤壁，“周瑜打黄盖”这一历史典故，就源于此，孙权以战功将此湖赐盖。

走近湖岸，但见水面宁静，岸线开阔。湖水浩浩汤汤，一望无际。岸边有荷、芦苇、菖蒲点缀，还有悠闲吃草的水牛。不时有两三只白鹭掠过水面，成群的鱼鹰聚集在一起，伺机搜寻它们的美食。

此情此景，让人很难想象去年这里的景象——竹竿林立，像一把把匕首，插在黄盖湖的胸膛；围网密织，网箱密布，湖面上摆起了迷魂阵，使舟楫不可畅游，让水鸟无胆喘息。如今通过整治，过度养殖的现象得到根本治理，水域生态环境大大改善。黄盖湖俨然成为了水乡农家的一处乐园。

湘北平原，棉田稻田，一望无垠。湘莲莲藕，菱角水芋，一路飘香。让环境变美的同时，临湘并未耽误经济发展，如今，绿色产业在这里蓬勃发展。走进新型职业农民张兵驹的农庄，匆匆赶来的他身材壮硕，皮肤黝黑，一副典型的农民形象。张兵驹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的种稻经。近年来专门从事粮食生产，走集约化路子，扩大土地流转规模，承包水田3000多亩，实行机械化生产，在传统种植水稻的基础上，承包荒山2000多亩，因地制宜，种起果树。他说，只有走产业化之路，乡村振兴才有希望。

穿行农庄，满眼是果树，枇杷刚过，黄桃已熟，梨子正茁壮生长，葡萄开始挂果。鸡鸭在果树下奔跑觅食，肥鹅曲颈高歌。张兵驹热情摘下一堆黄桃，让我们品尝，果肉质饱满，汁水丰盈，真真切切的大自然味道。

回程路上，长江大堤上“守护好一江碧水”七个大红字，让我明白了“又绿江南岸”的原因。

本期华文作品版推出4篇作品。肖克凡《前往武乡》讲述作者来到岳父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，探访八路军总部王家峪等革命圣地的经历，革命老区的一草一木让作者眷恋和不舍。加拿大作家李彦《不问汉唐问今宵》勾连起家史与现实、记忆与印象，在纷繁思绪中，古都西安今宵的繁华与民风的淳朴占据了作者的脑海。甫跃辉《心灵、命运和未来》回顾自己的成长与创作经历，把云南和上海两地作为观察中国的视角，体会作家不可逃脱的写作之命。葛取兵《又绿江南岸》讲述自己在湖南临湘市长江沿岸的考察见闻，当地环境保护、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所取得的成就背后，是临湘人打造“最美长江岸线”的决心。——编者

古城的美，是凝入骨髓、厚若黄土的美。槐花累累满枝桠的日子里，再次踏入古城——那梦里唤你千百回的故土。

正值暑期，校园里竹影扶疏，静谧安宁。藤萝架下，一对翘着长尾的喜鹊娇声俏语，旁若无人。寻寻觅觅，行至林荫深处,找到了那座大礼堂。

据说，这是校园里不多的老建筑了。于今人的眼光来看，大礼堂实在不起眼。既不高大，也不宽敞，仅有屋檐下那颗依旧鲜明的红五星，衬着深灰色砖墙，默默地诉说着70年前的辉煌。

趴在玻璃门上，双手遮挡住落日余辉的反光，期待地张望。视线尽头，隐约可见一道紫红色丝绒帷幕，沉甸甸垂挂在舞台上。一瞬间，眼前闪出了一个女孩的身影，容光焕发，英姿勃勃。

1950年秋天，在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的参军热潮中，西北大学200名学子应征入伍。三名女生之一，便是在中文系三年级就读的母亲。欢送大会上，礼堂里雄壮的歌声、激昂的口号此起彼伏，那颗年轻的心沸腾了。母亲即兴写下了一首小诗，登台朗诵：

朋友，伸出你的手！
告别，我要向你们，
我兴奋地、愉快地向你们告别，
因为我将要把自己的一切
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！
……

从这座校园里走出去，踏上革命征途的，不止是母亲。之前几年，全国解放前夕，即将从物理系毕业的父亲，偕同几个上了黑名单的同学，已悄悄撤离校园，穿越封锁线，奔赴延安。怎能不走呢，两个同学突然间便失踪了，在城外荒地里找到尸体时，才知道他们已遭暗杀中活埋。

历史的足音，早已远去，空余惆怅。身后的草坪



李靖坤绘

◎金台茶亭

心灵、命运和未来

□ 甫跃辉

我的故乡保山在中国西南的西南，已经挨着缅甸了。然而，我小时候很长时间里都以保山在中国的中心。我看电视上的天气预报，看的都是北京的，北京刮风，我便以为我们那儿要刮风；北京下雨，我也以为我们那儿要下雨。也不知道错了多少次，我才忽然惊醒，保山和北京隔着几千里，北京的风雨，轻易是到了不了保山的。忽然从中心的迷梦里清醒过来，意识到自己非但不在中心，而且是在边缘的边缘。

一直在这边缘又边缘的地方生长到19岁，通过高考，我去往2500公里外的上海。说实话，这并非计划中的事。高考前是计划考去北京的，然而，报志愿时才发现，那一年，我心仪的那所北京高校没到云南录取中文专业，而我心心念念要读的就是中文。没办法，换所学校吧，就这么稀里糊涂涂到了复旦大学。两个月后，到了外滩，望着陆家嘴林立的高楼，眼皮底下奔涌的黄浦江，熟悉的旋律不禁浮现心头，“浪奔浪涌，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……”既有青春的激情，也有入世的苍茫。想起来，几年前有位老乡就说过让我考到上海。莫非这是所谓的“命运”？

我其实是不相信“命运”一说的。“命运”在我们的语境里，似乎是一条早已划定好的线，上升下降曲折跌宕，无论你努力也好怠惰也罢，最后都是一声慨叹：“这就是命啊！”然而也有人想改变“命运”，消极的是找算命先生算命，看看未来是吉是凶，看看如何趋吉避凶。积极的呢，自然是只能靠自己。岂能将一己之命运拱手托付他人？

不过，我现在要说的“命运”，并非这个可以由算命先生或自己加以“改变”的命运。我想说的“命运”，指一切已然发生的、指向特定方向的不可更易的事情。于我来说，出生于大于云南，学习就业于上海，这就是我的“命运”。还有一个命运，那就是大三那年，我渐渐不怎么写诗了，而是趴在电脑面前敲击键盘写小说。一篇小说写出来了，很快有了第二篇、第三

我与新中国征文⑩

不问汉唐问今宵

那条通往小雁塔的弯曲狭窄的砂土路，早已不见了踪迹，父亲也已离去8年了。但他面对危难、搂着悲泣的我，唇角展露出的微笑，那坦然、达观的微笑，永远地烙印在了我童稚的记忆中，从此教会了我做人的坚强。

天色黑透了。城墙上亮起了一盏盏红灯笼。高大巍峨的城门楼上，镶嵌着“安定门”三个端庄的大字。灯影憧憧，映照出城墙下宽阔的林荫道、错落有致的花坛、石桥。面对着一波又一波载歌载舞的方阵，法国汉学家闭德世教授满是欣赏的神情。他说，最欣赏的，恰恰是这种男女老幼在街头即兴起舞的潇洒，世界上哪个国家的老人能像中国的老年人，活得这般惬意、这般快乐？

似乎是为了印证他的观察，那个执一杆大笔、蘸着护城河水在甬路上挥洒留墨的老人，再次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“老马家泡馍”。苍劲的笔触，在红灯笼的光影中逐渐淡化，消逝在夜色之中。

老人说，早年间，护城河只是一湾死水，暑热中，腐烂的鱼虾发出腥臭气，影响游兴。好在近几年接通了地下涵洞，引入活水，潺潺清流，成为夏日乘凉的福地。

我担忧古城干旱缺水，影响发展前景。老人却自豪地说，八水绕长安，咋会缺水哩！咱这搭是风水宝地。听说当初挑选首都，咱比北京只少了一票！

那夜的梦境，记不清了，唯记得天地间流淌着祥云，胸口溢满了温馨。

于晨光中醒来，步出校园西门，在繁华的街头，看到一家早餐铺，饭菜琳琅满目，分外诱人，实难取舍。末了还是破了戒，要了碗淡绿的荷叶粥，一枚精巧的槐花包子，外加雪白的豆腐脑，皆为加拿大小城里难以寻觅的佳肴，才区区10元小钞。

坐在古朴大方的木头桌椅前，一面细细品味盘中餐，一面打量着进进出出的老少，从心底里羡慕古城人平凡的幸福。

早餐铺隔壁，是一家眼镜店。拾阶而上，掏出损坏的眼镜，递给了柜台前那个稚气未脱的年轻小伙儿。正在担忧，万一他修不了该该如何时，年轻人已妙手回春，令我喜出望外。

多少钱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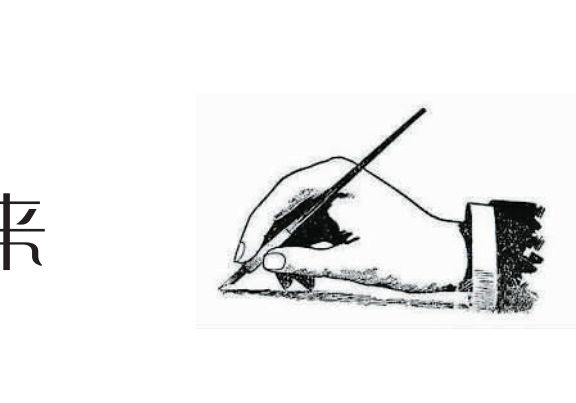
修理是免费的。

那怎么好意思呢！干脆，我买副新的吧，也不妄你费了一番力气。

可惜挑来挑去，终未能选到合意的镜架。不忍就这样离去，便打算给年轻人一点小费，聊做安慰。

小伙子却坚辞不受。“如果我收了，坏了规矩，老板会批评我的。”

我为故乡人民的淳朴善良，深深感慨。是古风犹存呢，还是新风气使然？



篇，然后，发表了……直到此时，我才意识到，写作将成为我此生的“命运”。

写作至今，10年有余，我常常问自己：你写了些什么呢？这些东西真值得写吗？你把它们写好了吗？答案是什么，我也不能确定。这几个问题最简单的是第一个吧，就连这，我也是看了别人的文章才意识到的：我小说里的人物，往往生活在云南或上海，或者同时生活在云南或上海。这些人物当然不是我，却有着我强烈的个人投影。

这其实不是我喜欢的。我不喜欢将人物限定在一个具体的地方,也不喜欢当下很流行的地域书写,无论那地域是实有的还是虚构的。我只想写人,普遍的人,并借由对这个人的书写,去书写全人类。哪怕我只写了一个人,我也执意使上书写全人类的力量。然而,这真的可能吗？

我渐渐意识到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
我得重新审视自己的写作，或者说，自己的“命运”。我今年35岁，云南，上海，到目前为止，差不多各自占据了我生命的一半时光。这两个地方对我意味着什么？云南有高山大河自然百态，上海有高楼大道科学技术；云南有众多民族，上海有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上千万移民；云南有各民族的传统文化，上海有多种时尚潮流……几十年来中国的巨变人所共见，如果把云南和上海当做我的两只眼睛，我相信，在对比中更能体察到中国社会变化的细微之处。

变化了的，又岂止是外在的物质？更有内在的心灵。所谓相由心生，反过来，外在的物质也是可以影响内在心灵的。怎么影响呢？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。生命是什么？人是什么？一个时代是怎样的？这个时代的人性是怎样的？以极大的热情去探究、呈现、质疑、理解这些……这正是众多写作者的“命运”。

生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用中文这种古老的语言写作，这是我的命运，也蕴藏着我对全部的未来。（本版图片来自网络）